

評論：《以影像紀錄臺灣》

Review: 〈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Issues and Methods in New Documentaries 〉 *

林克明^{**} Ke-Ming Lin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以影像紀錄臺灣》(暫譯))(2012) 作為第一本針對臺灣紀錄片進行討論的英文專書，它的意義究竟為何？顯然地，它的閱讀群眾自然並非是臺灣或者是以中文作為溝通工具的閱讀者，而是以英語系國家的閱讀者為主，更嚴格地說，是針對臺灣之外以英文作為主要知識交流平臺的泛西方閱讀者群。如此一來，當這些讀者從書名出發，面對這個第一本關於以紀錄片呈現臺灣的英文著作時，這本書就不可能只是對臺灣紀錄片的介紹如此簡單，它無疑成為這些泛西方讀者唯一認識臺灣紀錄片的知識框架。

基於這個前提，本書對讀者在閱讀上便存在某種立場，而當這個立場遭遇到編者／作者對於內容所做的設定或企圖時，特別是當編者並未自覺到這本書所具有的特殊情境位置時，很自然地，讀者會在閱讀的過程中形成某種偏斜。這種偏斜的產生無可避免，卻時時刻刻左右讀者對本書的閱讀，因此必須在進入本書的詳細討論之前首先被提出，以作為一種反思的基點。*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一書由兩位旅美學者（林麗君和桑梓蘭）所共同編製，共收錄九篇文章（含導論），分別由國內外從事紀錄片相關研究的學者所撰寫。在整個文章順序的安排上，雖然書中並沒有清楚的區部標示，但編者在導論中則說明了本書主要分為兩個區塊：第一部份收錄了李道明與兩位編者的三篇文章，這三篇文章主要是處理臺灣歷史再現的議題。第二部份則稍微凌亂，但如編者所述，主要是討論臺灣新

* 書籍資訊：Lin, Sylvia Li-chun and Sang, Tze-Lan Deborah (eds). 2012.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Issues and Methods in New Documentaries*, New York: Routledge.

** 林克明，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系助理教授。
Ke-Ming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紀錄片如何以各種「具有創意能量和雜音」的方式參與當代的社會、文化或政治議題（p.4），這些議題包括臺灣性（Taiwaneseness）的形塑、社區再造、紀錄片倫理、環保抗爭等等。

第二部分的文章安排初看關聯不大，而文章中所評析的紀錄片也沒有一定的年代安排（如本書第二章是李道明的〈（重）製歷史〉，文中討論的紀錄片是2007年公視所製作的《打拚—臺灣人民的歷史》，而第三章由林麗君所著的〈螢光幕前重現白色恐怖〉，討論的紀錄片則是1995年的《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這部份的雜亂似乎容易讓讀者產生一種編者並不清楚為何與如何選擇這些文章的錯覺。然而在導論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編者將第二部份的文章選輯再細分為認同與反思性兩個區塊：前部份包含了 Bert Scruggs 和蔡秀粧的兩篇文章；後部份則收錄邱貴芬、Christopher Lupke 和郭力昕的三篇文章。這個進一步的區分透露出編者對於臺灣紀錄片發展所具有的某種史觀，而這種史觀無疑讓這些看似散亂的文章選擇和編排產生一個可辨明的脈絡。

從這些選文中，兩位編者所認為的臺灣紀錄片的真正發展，明顯是從1986年綠色小組的《桃園機場事件》起飛。在綠色小組的引領之下，配合1987年解嚴，讓過去被壓制或隱而不見的議題得以被揭露，而為臺灣紀錄片注入了新且旺盛的生命力。不難想像，這些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議題多數與被忽視或醜化的歷史有關，因此帶出了一片重新省思臺灣歷史的熱潮，而重製（remaking）歷史、重現（recreating）歷史、恢復（reclaiming）歷史便成為臺灣紀錄片發展首先面對的一個最重要課題，這也成為本書第一部份中三篇文章所思考的重點。而隨著歷史重新省思之後，與其緊密相關的便是臺灣人的認同建構。此一課題雖然在第一部份已多少著墨，但由於歷史省思後所產生的國家認同模糊，而使得如何在各種差異中尋找臺灣人所具有的共同性，便成為臺灣紀錄片工作者所面對的另一個迫切的問題。第二部份前半的兩篇文章即是探討以此為核心的兩部紀錄片：在2005年在票房上均獲得極大成功的《無米樂》和《翻滾吧！男孩》。而在第二部份後半，編者則轉向反身性的問題，也就是在討論紀錄片對於臺灣歷史和認同重建的貢獻之後，開始反省拍攝者與其作品的關係。這個內容的轉向顯然是反映臺灣紀錄片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個人紀錄片」（personal documentaries）類型的蓬勃發展。因此總體來說，雖然本書中選取的電影和評論並未清楚地依據時間來排列，但是從整個文章的編排走向來看，編者卻隱約勾勒出臺灣紀錄片發展的走向。



本書編者所希望鋪陳的臺灣紀錄片發展脈絡，很清楚地，是一個非常「政治」取向的發展。編者在導言的開頭，即將綠色小組的行動作為臺灣紀錄片的發展起點，而其中許多章節均以政治作為討論主題。在本書的結尾，則是以郭力昕的〈濫情主義與集體「內省」現象〉一文作為結束。郭力昕的這篇文章是針對臺灣紀錄片在 1990 年代末期朝向「私密化」和「濫情化」的發展所做的抨擊，而其主張正是希望回歸過去綠色小組的取向，也就是讓臺灣紀錄片能不再侷限於個人式的呢喃，而是嚴肅的政治議題。郭力昕的這篇文章在本書中有其重要意義，因為它作為本書的結尾，不僅呼應了編者導言中所隱含的政治意義。更重要的是，由於其作法有別於其他文章：它並非如其他文章中僅侷限於對單一紀錄片的討論，而是對於 2004 年《生命》之後的個人紀錄片進行全盤的檢視，其中也包括 Scruggs 和蔡秀粧兩篇文章所分析的《無米樂》和《翻滾吧！男孩》兩部紀錄片。因此以某種角度來看，郭力昕的文章似乎可以視為對此兩篇文章一種「政治」取向的補充／批判。這個以綠色小組開始、以批判私密性作結的文章安排，無疑是反映出編者所主張的臺灣紀錄片（應有）的「真實」原貌：政治。¹

本書從政治取向出發的文章和電影選擇無可厚非，因為正如紀錄片的本質一般，本就不是作為「忠實客觀」的紀錄，而是依據製作者的主觀論點，將素材適當地選擇和安排的論述。²對此，可以進一步提出幾個問題。首先，依據本書的安排和主張而言，編者所企圖探討的是綠色小組以降臺灣獨立紀錄片的發展，就這個角度來看，編者所思考的臺灣紀錄片或許可以歸類為左派紀錄片。在此暫不討論這些文章和電影是否有能力含括整個臺灣左派獨立紀錄片的範疇，而是去思考一本關於左派紀錄片的著作應該著重在那裡。William Alexander 在他關於美國左派紀錄片的重要著作 *Film on the Left* (1981) 的結尾提到：

一個藝術家和教育家的角色，是幫助人們以他們的影像和語言去定義他們的情勢，以及去有效地幫助他們發現可用的方法來改善目前的狀況。這些方法必須從一開始就是改革的，而只有之後，當觀眾已經被揭露新的可能性時，他們才能夠對階級產生意識，以及具有革命意識。這個覺醒代表著看與聽的能力，代表著真誠溝通的能力，代表著得以對理論和行動硬加使用這種企圖的迴避，而能夠透過實現和抗爭的過程讓理解逐步產生。

透過 Alexander 這段話，可以發現左派紀錄片的工作，是以一種批判性的角度去紀錄人們

¹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本文中的政治取向並非僅僅是針對於直接的政治議題拍攝，而是指能否具有政治啟發的可能。郭力昕在〈濫情主義與集體「內省」現象〉一文中，對此取向有進行詳細的探討，頁 185-6。

² 見 Bill Nichols 的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1991), p. x.



的影像，以揭露他們的「真實」面貌，而藉由這種真相的揭露，觀眾才能以一種批判的角度來重新認識他們的環境，並進而進行改革。Alexander 對左派紀錄片的認知，事實上是與紀錄片（documentary）本身的字源意義不謀而合：去紀錄（to document），在過去意味著進行教育（to teach）。³如果（左派）紀錄片的精神意味著教育群眾，那本書作為一本以政治取向出發的紀錄片文集，是否能彰顯這層意義？很清楚地，這本書中的文章或多或少都提供了一種教育的功能，藉由重新理解／補足／批判所分析的紀錄片，讓觀者得以進一步掌握這些影片中所具有的「認識現狀」的新可能：如桑梓蘭以批判性的角度思考《跳舞時代》中對女性角色探討的忽略；同樣地，蔡秀粧也對《翻滾吧！男孩》中看待原住民的態度提出某種反省；而郭力昕的文章更提供一套具體的論述方式來重新檢視近年來臺灣紀錄片的不足。從這些文章的選取來看，本書的確符合左派紀錄片的精神：它不僅讓讀者／觀者注意到臺灣紀錄片揭露「真實」的可能，同時也讓讀者／觀者去注意到臺灣紀錄片中所未揭露的「真實」。

雖然如此，在這個政治取向的脈絡下，本書所面對的一個比較大的侷限，或者在於它似乎過於偏重紀錄片本身的文本分析，而對於與紀錄片製作相關的媒體／組織層面的討論則相對貧乏。在整本書中，除了李道明一文涉及公視組織對紀錄片籌畫／拍攝的影響外，其他文章均極少涉及此一部分的討論，因此讀者無法具體掌握到公視紀錄片製播計畫、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等影展、紀錄片系所及課程等培訓機構、以及主流媒體紀錄片節目製作等各種組織性參與對整個臺灣紀錄片發展的影響。缺乏這個組織層面的探討和批判，對於從「政治」出發的紀錄片論述而言，似乎就顯得不夠「政治」。

除此之外，這個不夠「政治」的問題，同樣也發生在本書所宣示的意圖和作法的連結上。編者在導言中說到她們對文章所挑選的依據：「這些文章和其檢視的電影中所敘說的各種主題，不僅對臺灣是特殊唯一的存在，對於廣大的紀錄片工作者社群，更是密切相關」（p.4）。這個特殊唯一的存在，無疑是以政治為起點的臺灣紀錄片發展。至於為何相關呢？編者進一步說明：「這些文章的作者也探索了紀錄片作為再現工具的可能和侷限，而在文章中適切地表達出對於紀錄片倫理、創新技巧、以及過份強調人情味故事的隱憂所做的探討。」（p.4）換句話說，這些問題同樣也是臺灣以外的紀錄片工作者所可能面對的。特別是當他們遭遇到市場和理想的衝突、製作工具的進步等挑戰，如何能持續對紀錄片「政治化」的堅持時，這些「臺灣經驗」或許可以幫助他們打開一扇思考的窗。這個說明隱含著，

³ 見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中對 document 一字字源的探討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term=document&allowed_in_frame=0 (瀏覽日期：2012/09/10)



本書所預設的目標讀者群顯然是泛西方的紀錄片工作者，而本書所期待的是，這些經驗能激發更多政治紀錄片產生的可能。然而，對於這個目標群眾以及期許所產生的問題在於，在本書選錄的這些文章中，我們極少聆聽到紀錄片工作者真正的聲音。嚴格來說，本書關於此方面的文章只有李道明本身作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參與經驗，以及邱貴芬一文中導演蕭美玲的陳述，其他絕大部分的文章多是研究者從資料和影像中所進行的文本分析。在此並非是要指稱這些文章無法讓閱讀者對於這些紀錄片有更徹底的認識，而是在於當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能帶給泛西方紀錄片工作者更多臺灣經驗的啟發時，讓紀錄片工作者本身的聲音被傾聽不是能夠達到更大的效果？就如 Alexander 對美國 1930 年代的左派紀錄片工作者進行長時間的訪問，讓他們自己傳達出對影片製作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成功與失敗、驕傲與膽怯、執著與退縮。因為他相信，唯有如此，才能挖掘出有價值的經驗，而能夠啟發和維繫左派紀錄片工作者的熱情。就這點來考量，本書受限於它本身的作法，固然所傳達的政治意圖明顯，但其所期待產生的政治刺激或許是不足的。

以此出發，從本書中能夠獲得更多啟發可能的，或許並非本書所預期的紀錄片工作者，而是希望對臺灣紀錄片有更多理解的觀影者。這個落差使得我們必須重新從閱讀者的角度來思考這本書。因此，雖然以一本標榜左派紀錄片的作品而言，本書政治取向的作法是極有價值的，但作為第一本關於臺灣紀錄片的英文著作，這個方向的適切與否便值得仔細考量。回到本書的標題 (*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在這個題目的設定下，泛西方閱讀者對本書的期許是希望從中掌握臺灣紀錄片的面貌——而這也是他們目前在影像之外，能夠系統性接觸臺灣紀錄片的唯一途徑——但面對本書以政治為取向所做的選擇和安排，一種偏斜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可能是，閱讀者落入臺灣紀錄片即是政治紀錄片的狹窄視野；不然，閱讀者就會對此認知的期待和結果之間的落差感到失望。

臺灣的紀錄片是否只能由政治和不政治的角度出發：前者受讚揚，後者需批判？受限於政治紀錄片的宣示，臺灣紀錄片是否只能在綠色小組之後才得以稱為「臺灣紀錄片」？對這些問題，本書很可惜地都未提出某種補充性說明。而更重要的是，基於為了建立起一種批判的可信立場，本書所針對的臺灣紀錄片，往往是在市場贏得成功票房或者在影展中獲獎而廣受注目的知名紀錄片，它們本身基於其市場性或者政治性而具有批判的價值。如此一來，這個政治取向所產生的結果是，泛西方閱讀者無法知曉臺灣在綠色小組之前就有《劉必稼》(1966)、《芬芳寶島》(1975)等紀錄片，也無法以更多面向的角度來思考臺灣紀錄片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整本書的架構安排下，讀者對書中所有文章和電影都被要求以一種「是否合乎政治」的角度來檢視），更無法知道臺灣還有許多未進入市場機制或不



被影展青睞的紀錄片，或者不易「批判」的紀錄片。雖然編者在導言中說明了，「讀者可以立即所見，本書並非對臺灣紀錄片進行全面研究」（p.3），藉此告知讀者這並非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臺灣紀錄片介紹，而是具有某種選擇性的導引。但是當讀者在書名和編排的引領中，進入編者對臺灣紀錄片所建構的認識框架，這個簡單的編者說明，似乎很難去撼動讀者因本書所建立的對臺灣紀錄片的理解。

對於這些問題，或許都可以藉由在導言中提供讀者一個清楚的認識藍圖來得到某種舒緩。但很可惜地是，導言過於簡略，致使本書在閱讀過程中的偏斜始終存在。儘管如此，*Documenting Taiwan on Film* 作為第一本向泛西方讀者介紹臺灣紀錄片的著作，不管它內容是否有所侷限，這本書畢竟踏出了第一步，讓泛西方讀者察覺到臺灣除了有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李安等人所創造的獨特且迷人的虛構電影外，還發展出多元且創意十足的紀錄片文化。我們期待有第二本、第三本……關於臺灣紀錄片的英文著作產生，讓泛西方讀者對臺灣紀錄片的理解能更多元、更豐富。

參考文獻

Alexander, William. 1981. *Film on the Left: American Documentary Film from 1931 to 194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ichols, Bill . 1991.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